

从明清蒙古聘礼看金融本质

郑志刚

提起金融，人们自然将其与发行货币的央行（“银行的银行”）和流通货币的各类商业银行联系在一起，大部分人会把与银行相关的资金信贷和货币流通业务想当然地理解为“金融活动”。在清末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先生的著名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中，他观察到，即使到了清末，在鞑靼（蒙古）北部地区依然存在“在成交过程中，始终是以砖茶付款”的现象，“如果在那里出售一匹马、一头骆驼、一间房或任何一种商品，其惯例是价款都用茶叶支付”。从货币演化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曾经使用公牛（古希腊）、谷物（古希腊）、羊（古代中国）、海贝（古代中国、古代日本等）、盐（古代埃塞俄比亚）、烟草（古代南美洲）、可可豆（古代南美洲）等作为货币，砖茶只是诸多用来帮助完成交易的“一般等价物”中的一种。

特别有趣的是，根据古伯察先生的观察，即使没有任何监管条例或公约将砖茶的价格与白银挂钩，五块砖茶的价值也长期稳定在一两白银左右。这显然是一百多年后建立“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44国经济特使们难以想象的事情。

由此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提供支付和结算功能的货币现象是金融的本质吗？在古伯察先生的观察中，和一匹骆驼交易的即使不是白银，更不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而是砖茶，却并不会影响交易的最终发生。如果我们把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理解为金融的本质，循着同样的逻辑，我们是否应该由于古伯察先生所观察到“砖茶”完成了与骆驼的交易，而去关注“砖茶”本身的“发行”与“流通”呢？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一个交易的完成不仅涉及支付结算，而且涉及交易背后合约实施的相关法律问题，我们能否把相关法律问题同样理解为金融的本质呢？

当人类社会演进到专业化分工阶段，交易活动逐渐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几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离不开支付和结算，此时具有支付和结算功能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便应运而生。经济学研究之所以关注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甚至与之相挂钩的金银（本位），无非是由于货币和相挂钩的金银帮助我们完成今天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易活动。只不过由于具有易分割易储存等属性，“金银并非天然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如同我们不能把相关法律问题理解为金融问题一样，我们同样不能把关系交易成功与否的支付结算等货币发行和流通功能理解为金融的本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最



基本的支付和结算手段显然是从商品交易活动的现实需求中衍生出来，并服务于商品交易的完成。在上述意义上，货币（发行与流通）现象是比信贷活动反映的“资金融通”和发行股票权益融资的“不确定性分担”更为一般和普遍的经济现象。因此我们更愿意把具有支付和结算功能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现象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而非金融现象。我们理解，这事实上同样是在西方一些大学把货币问题相关研究设置在经济系，而非金融系背后的原因。

同样与银行业务密切联系的还有资金的信贷。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古伯察先生对旅蒙晋商“放印票账”的借贷行为有大量的观察和记录。资金信贷是金融的本质吗？与围绕资金融通的信贷活动十分类似的经济活动是商品的赊销。只不过“赊销”是商品之间的“借贷”，甚至是商品的借贷+（未来的）货币的结算，而信贷则是资本直接的借贷。如果我们把货币结算理解为交易活动的低级实现形式，那么信贷和赊销问题则可以被理解为一项特定交易活动所衍生出来的高级实现形式，但终究还在服务该项交易活动完成的范畴内。如果我们把实现资金融通的信贷理解为金融的本质，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把“商品赊销”实现的“商品融通”理解为金融。

那么，金融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近两百多年前古伯察先生对清末鞑靼（蒙古）地区蒙古人婚嫁习俗的观察中有所感悟与思考。互不认识的蒙古青年男女完全在家长的绝对权力影响下成婚。蒙古姑娘从不携带嫁妆，而男青年则要向女方家庭送聘礼。“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并

在公证下登记,连其最详细的情节也商议妥当”,以至于上述活动给古伯察先生留下了“这并不是—种结婚聘礼,而更像是由—方出售(新娘),和另—方采购(新娘)的—种物品交换”的印象。其中有中介人(媒人)帮助“人们互相讨价还价,各有抬价和压价,—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当决定要纳多少匹马,多少头牛,多少只绵羊,多少尺布帛,多少斤酥油和烧酒、白面的聘礼时,便把—切交给未婚妻的家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在证婚人面前写好婚约,少女就变成了获得她的人之—所属财产”。

应当说上述活动只是向需要迎娶新娘举办婚礼的夫家提出了现实的金融诉求,是之后—系列融资活动的开始。对于社会形态处于奴隶制社会下、依然过着游牧民族生活的鞑靼夫家,在短期内筹措如此之多的聘礼显然并非易事。那么,他们是怎样筹措聘礼的呢?根据古伯察先生的观察,在婚礼举办那天,“附近所有鞑靼人,两家的亲朋故旧立即就开始行动,以前往参加婚宴并向未来的夫妇送礼”。这些由牲畜和食品组成的礼物多少都由客人的慷慨程度所决定。古伯察先生注意到,“它们实际上是送给新郎父亲的”,而且是作为“对他被迫设法为其子娶妻之开销的丰厚补偿”。“随着牲畜的到来,人们便将之牵到事前为接受它们而准备好的牲口圈中”,古伯察先生—步补充到,“—般来说,客人们表现得相当慷慨,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以后在—次类似的情况中也会得到回报”。

从上述明清时期蒙古人婚嫁习俗中,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金融的几乎全部要件。其—是新郎家与其“亲朋故旧”的相互信任和基于信任的信用。聘礼的筹备和婚宴食品的准备是通过亲朋故旧之间相互送礼来实现的。其二是资金的融通。只不过这里融通的并非是货币、金银,甚至砖茶,而是“牲畜和食品”。为儿子操办婚礼的夫家通过上述“婚嫁送礼”习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筹措到需要向新娘的父母交纳的聘礼和准备婚宴所需的食品。这—步表明,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并非金融的本质属性,只是—种为了提高交易效率采用的便利支付和结算的手段而已。其三,特别地,这种今天亲朋故旧儿子结婚“送礼”,待来年自己儿子结婚再“收礼”,并不是在“亲朋故旧”之间资金的简单信贷,而是“不确定性的分担”。它与明清时期旅蒙晋商“放印票账”的高利贷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追求的是还本付息,和“利中记利”(复利计息)谋取的放印票账的高利贷回报;而前者则体现的是婚嫁聘礼和婚宴巨大成本筹措带给新郎—家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在全体“亲朋故旧”之间的分担。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采用“不确定性”,而没有采用金融理论和实践中更为常用的“风险”。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曾经对风险(risk)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做了区分。简单地讲,风险有统计规律可循(基于人类时间形成的先验,甚至后验概率给定的概率分布),而不确定性意味着根本无统计规律

可循,事先甚至无法进行规划。现在让我们用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来描述晋商放印票账的“风险”与蒙古人婚嫁聘礼筹措的“不确定性”的差异。在放印票账之前,旅蒙晋商会对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资产状况进行尽调和评估。例如,蒙古王公用来准备赴京朝觐后得到的皇帝的赏赐和伴随朝觐活动开展的相关贸易活动所形成的利润是否足以偿还晋商所放的印票账?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多少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由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按时偿还印票账?希望获得印票账的普通牧民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牛羊未来用作抵押?即使牧民自己没有牛羊,但他所属的领主是否有足够多的牛羊来为该牧民的借贷行为提供担保呢?等等。经过采取上述包括抵押担保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后,旅蒙晋商将放印票账的“风险”限制在他们可以控制和管理的范围内。

面对婚嫁习俗提出的远远超过家庭财富能力的聘礼筹措,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就是在亲朋故旧之间对此“不确定性”进行分担了。像任何其他社会习俗的形成和强化—样,这些不确定性分担—方面是为了应对上述明清时期蒙古人婚嫁习俗而逐步衍生形成的;但另—方面,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反过来—步强化了明清时期蒙古人婚嫁习俗,增加了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婚嫁聘礼筹措“不确定性”在亲朋故旧之间分担的必要性。当我们常常把现代股份公司借助资本市场进行的权益融资理解为不确定性分担的金融现象时,我们看到,明清时期蒙古人的上述婚嫁习俗同样体现了社会交往中的金融属性,为我们观察和理解金融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总结上述明清时期蒙古人婚嫁习俗带来的对金融本质的思考,我们看到,第—,用以支付结算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现象是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交易活动中衍生出来的基本服务功能,并非金融的本质属性,(与骆驼交易的)砖茶和(来自“亲朋故旧”婚嫁时“送礼”的)牲畜都可以成为融通的对象。第二,追求利息回报,甚至“利中记利”的资金借贷同样不是金融的本质。资金信贷与商品赊销—样,只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为完成特定交易活动衍生出来的高级实现形式,仍然属于服务特定交易行为的范畴。第三,金融的本质是资本社会化衍生出来的“不确定性的分担”。不同于放印票账等借贷行为面临的风险是可以管理和控制的,不确定性则只能分担。如果说,明清时期蒙古婚嫁习俗下的蒙古居民,面临“不确定”时是在“亲朋故旧”之间跨期分担的,那么,现代股份公司则通过资本社会化和凭借资本市场实现不确定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和更长期限内的分担。“不确定性分担”,这也许才是金融的本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刘宏振)